

改造動員：太行根據地的糾「左」^{*}

王龍飛^{**}

摘 要

動員是中共重要的革命話語和實踐，中共在革命歷程中，動員的方式以及對動員的認識都在不斷調整。動員的一大困境是要麼動員不起來，要麼過「左」。抗戰階段，基於太行根據地相對特殊的內外環境，過「左」傾向一度強烈發展，對根據地造成嚴重傷害，不得不嚴厲糾正。在「左」與「糾左」的反復中，領導上對「左」的認識發生了顯著變化，大體而言就是「左」不可怕，甚至是必要的，因領導上認為群眾運動是可控制的。在對「左」的處理上，得出的一個重要經驗是：要區分群眾行動上的「左」和組織領導上的「左」。前者不可怕，對後者則須保持警惕。從往後的歷史進程來看，這種關於「左」的認識和判斷以及動員的困境並未就此而止，而是一再出現。

關鍵詞：群眾動員、糾「左」、太行根據地、黎城會議

^{*} 本文係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基於基層檔案的太行根據地『全民皆兵』體系研究（1937-1945）」（17CZS046）階段性成果之一。本文曾提交「轉折年代：從新文化運動到國民革命」青年論壇（北京大學，2016年8月），得到王奇生、胡永恆、李志毓、瞿駿等師友指教；兩位匿名評審及編委會複閱人也為本文給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7年12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5月30日。

^{**}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組織動員是共產革命的主要路徑。中共在革命歷程中，對動員的方式以及認識都在不斷調整。動員的一大困境是要麼動員不起來，要麼過「左」。¹早期的動員側重於思想輿論宣導，以理念啓發吸引人；大革命時期（1924-1927）則演變為多種方式的綜合運用，其中經濟手段尤為顯著。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可以憑藉的資源有限，需要通過一些槓桿（如資金）來撬動群眾。群眾在中共的視野中是需要被教導和訓練的，但在二者的關係上，中共雖處於主動卻相對弱勢——有求於群眾，其需要通過群眾運動來壯大力量、發出聲音以及改變局面。

到了江西時期，中共通過公開的武裝反抗實現了局部割據。在自己可以掌控的地盤內，中共明顯強勢。特別是在面臨國民黨嚴峻的「圍剿」壓力時，強力的、竭澤而漁式的動員愈演愈烈，激烈的「查田」、「擴紅」產生諸多嚴重問題。²可以想見，即便第五次反「圍剿」再次以勝利告終，蘇區也不得不面對這輪強力動員對當地社會造成的嚴重創傷。

抗戰時期，和蘇區時期相類似的是，中共在多地建立了敵後抗日根據地，根據地內也建立起黨政系統，處於事實上的執政狀態。處在抗日前沿的根據地，面臨遠比蘇區時代更為複雜、嚴峻的生存環境。為保衛和發展根據地，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這種情形下的動員何去何從？這正是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

太行根據地作為中共華北抗戰的樞紐，長時間處在對敵鬥爭前沿，日軍在太行及其周邊地區的駐軍少時 4 萬，多時 8 萬。³根據地被條塊分割，還面臨

¹ 左本是共產黨基本的意識形態傾向，在中共的語境中加引號的左，有非真正的左及超出必要程度的意義，帶有明顯的負面色彩，本文循此例。一如毛澤東的定義：「什麼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鬥，這是『左』，這個不好。」詳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卷 6，頁 403。

² 相關問題黃道炫在《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一書五、六章有精彩論述。

³ 〈五年來對敵鬥爭的概略總結與今後對敵鬥爭的方針——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鄧小平同志在太行分局高幹會議上的報告〉，《戰鬥》，增刊期 15（1943 年 3 月 15 日），頁 18-20。

一次又一次殘酷的「清剿」、「掃蕩」，特別是因多種政治力量並存，在較長時期內還需要兼顧「統一戰線」。相較陝甘寧這樣相對單純的邊區，太行根據地處在「統一戰線」的環境中，人力物力動員必然更為複雜。本文將基於抗戰時期的中共太行根據地，圍繞群眾運動的實踐，特別是其中的轉變及其遭遇的困境展開論述，以期豐富對革命動員及相關問題的認識。⁴

一、動員激進化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後，中共方面的判斷是華北正規戰階段基本結束，以八路軍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階段開始。基於此，已開往山西的八路軍得到的指示是「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徵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⁵ 中共中央的指示雖然明文提到在統一戰線的原則下開展工作，但在閻錫山勢力還明顯存在甚至佔據優勢的情況下，無論是「放手發動群眾」，還是「不靠國民黨發餉」，都明白預示著實際工作將充滿緊張和鬥爭，也將突破國共之前的協議。工作方式激進化事實上也成為這一階段群眾運動及根據地創建工作的基本特徵。

⁴ 新近關於對根據地「左」的討論，廉如鑒，〈土改時期的「左」傾現象何以發生〉，《開放時代》，2015年第5期，頁150-161，一文值得注意，該文的論述對於加深這一問題的理解有積極貢獻。不過，廉文側重於分析產生「左」傾現象的一些機制性要素，對「左」的發生演變著墨較少。亦即側重於成因分析，而忽略過程性的探討。另外，廉文討論的對象是國共內戰時期土改中的「左」傾，對與之關係甚密的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運動並未予以足夠的關注。相關研究中，王奇生對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考察：〈革命的底層動員：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收入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61-97、李里峰關於「群眾」話語的辨析：〈「群眾」的面孔——基於近代中國情境的概念史考察〉，收入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七卷）》，頁31-57、黃道炫的中央蘇區研究：〈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金沖及有關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會議的述論：〈劉少奇和白區工作會議〉，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科研管理部編，《歷史偉人劉少奇——紀念劉少奇百年誕辰論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18-39等，也都不同程度涉及群眾運動的多個側面，予本文以有益啓示。

⁵ 〈關於太原失守後華北我軍軍事部署的指示〉（1937年11月8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冊11，頁384。

發動廣大群眾、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是中共對於抗戰的基本觀點。時任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在抗戰爆發三個月時，稱全華北黨的中心任務是「組織與發動廣大的反日游擊戰爭」，而完成這個任務的中心環節是「能發動廣大的群眾運動」。對於如何發動群眾，除了常規性的宣傳手段，劉少奇明確指出「堅決地去發動與組織群眾的經濟鬥爭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因此要求「一切黨員要堅決地領導廣大工農群眾的經濟鬥爭」。劉少奇解釋了為何要推動群眾經濟鬥爭——「群眾經濟鬥爭的發展，就是階級鬥爭的發展，在目前就表示著黨對於群眾運動的獨立領導」。劉少奇進一步提到，要堅決反對在抗戰期間不能發展工農經濟鬥爭的理論，因為「取消工農的經濟鬥爭，就幾乎等於取消群眾運動」。⁶

可見，這一時期領導上是將經濟鬥爭作為發動群眾的突破口。按照劉少奇的解釋，工農經濟鬥爭主要包括工人救國自由、承認工會、增加工資、星期日休息照給工資、退工時給退職金、自衛隊出操不扣工資以及普遍減租 25%、佃六主四共分收成、減息到一分以下、減少窮人捐稅攤派、增加雇農工資、組織農會等項。⁷以上要求中的大部分都與當時的實際情形存在較大差距，要實現這些目標，工人與資方、農民與地主之間非經歷尖銳的鬥爭不能至，由此展開的鬥爭因而極易向「左」。

形勢上的緊迫也加劇了群眾運動「左」傾。區區數萬八路軍進入自身並無根基的山西，面對危機四伏的局勢，在謹慎觀望應對的同時，最重要的任務便是迅速壯大自身以及佔據可以憑藉的立足地。面對可能急劇變化的形勢，一切都刻不容緩。冀豫晉省委對內機關刊物《戰鬥》首期刊文宣導「大刀闊斧的工作作風」，白區同志在長期白色恐怖環境中形成的從下而上一點一滴的工作作風，因不能執行「最迅速與最大限度」的動員群眾任務，而被認為是不合時宜

⁶ 劉少奇，〈為發動華北廣大群眾的抗日救國運動而鬥爭〉（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卷）（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54-56。

⁷ 劉少奇，〈為發動華北廣大群眾的抗日救國運動而鬥爭〉（193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卷）（上）》，頁56。

的，因為「一天一時的光陰，都關係於敵我力量的準備和政治軍事的機宜」。⁸

《戰鬥》第二期中省委繼續籲陳發動民眾、擴大八路軍、創造根據地是「再急迫也沒有的事情」。⁹

類似的鼓動，此後也不斷出現。1938年6月，冀豫晉省委在布置任務時號召全體黨員「用堅決、堅實、艱苦、堅定的工作與奮鬥精神，以緊張、準確、迅速與一致的戰鬥作風」為完成任務而鬥爭。¹⁰「大刀闊斧、迅速堅決」的作風為組織所期待，晉中地區因此受到表揚。¹¹時任晉冀特委副書記彭濤在特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掃除過去遲緩散漫鬆懈的作風」、「學習紅軍蘇區黨的作風」，號召「以戰鬥的精神，嶄新的作風，飛機的速度，競賽的方式」超額完成計畫。¹²

從這個意義上說，領導上給太行區群眾工作方式的基調定為「鬥爭」，並且是放手大幹快幹。在這樣的政策之下，戰鼓頻敲，緊張激烈的鬥爭呼之欲出。

不過，日後山西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並不是此時才開啓。出於發動群眾以禦外侮的迫切需要，閻錫山主動借助長於此道的中共在晉地開展群眾運動。在中共黨員薄一波等人的參與和主導下，廣涉軍隊、民眾的「總動員」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在發動民眾方面，千餘名村政協助員被分派到全省各地，他們既宣傳抗日救亡，也宣傳閻錫山關於「消除社會不平」、「制裁壞官、壞紳、壞人」的主張。短短三個月，犧牲救國同盟會（犧盟會）會員即發展到數十萬。¹³也

⁸ 秋寒，〈論統一戰線和獨立自主的工作作風〉（1937年11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18-19。

⁹ 冀豫晉省委，〈目前軍事發展的形勢及我們××區組織問題的提議〉（1937年11月15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卷）》，頁37。

¹⁰ 冀豫晉省委，〈新形勢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務〉（1938年6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卷）》，頁224。

¹¹ 〈中共冀豫晉省委給北方局並中央的總報告〉（1938年6月22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卷）》，頁244。

¹² 彭濤，〈五月的贊皇——在晉冀特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提綱〉（1938年7月），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上）》（內部文件，1943年11月20日），頁33-34。

¹³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217-218。犧牲救國同盟會是閻錫山批准成立，受中共山西工作委員會領導的，以青年為主的群眾抗日團體，在山西抗戰中發揮重要作用。

正由於「總動員」的作用，在八路軍進入之前，山西廣大鄉村已經激盪起來。如薄一波所言：「工作開始了，真如黃河決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幾千年來被壓抑著的民氣覺醒起來了。」薄一波稱這種情況，「真有點當年湖南農村大革命的味道」。¹⁴在被喚醒之後，民眾開始發出種種訴求：要求一個堅決抗戰而且更能代表民意的政府，要求改善生活、反對土豪劣紳、與壞村長算帳，要求廢除過重的租稅……等等。這類事情每天都在發生，處在最前端的村長壓力甚大，以致綏靖公署平均每天接到五、六件村長狀告村政協助員的電報。¹⁵

在戰爭和閻錫山的「全民總動員」作用下，在八路軍進入山西之前，原本平靜的鄉村已經被激盪起來。由此可見，北方局以鬥爭為中心的動員策略不啻火上澆油。

在激進政策的引導下，民氣已起的鄉村，鬥爭氛圍愈發濃郁，「左」的傾向日益突出。這一時期鬥爭的矛頭主要指向地主富農等有糧款積蓄者。農民抗日救國會（農救會）的報告稱，在屯糧「突擊」中，只管完成數目字，只管「戰鬥」地「完成任務」，至於什麼群眾路線、老百姓的死活，什麼政治動員、工作方式，管不了那麼多。只重收穫不選擇手段，有些地方甚至以動員物資多寡來測驗工作成績，改善人民生活的計畫都成為空喊的口號。¹⁶「合理負擔」政策打著「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的口號，表面上看合情合理，實際則遠非如此。晉冀豫區委¹⁷稱「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的原則帶有「軍事共產主義意味」，對於發動鬥爭效果最為明顯，但真正的合理負擔並沒有實現，反而對生產造成嚴重打擊。¹⁸

¹⁴ 薄一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成功實踐——薄一波同志答問錄〉（2005年8月23日），薄一波著作編寫組編，《薄一波論新軍》（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頁475。

¹⁵ 薄一波，〈犧牲救國同盟會簡史〉（1938年9月），《論犧盟會和決死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頁82。

¹⁶ 〈晉冀豫區農救總會二年來工作材料〉（1941年6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406。

¹⁷ 1938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安排，華北各省委領導機關陸續改稱區黨委。另外，1939年1月，區各特委改稱地委。

¹⁸ 〈中共晉冀豫區委會議記錄（二）〉（1938年8月24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卷）》，頁324、330。

遼縣是晉冀豫區委兩個直屬縣之一，在建設實驗縣中即將屯糧作為開展群眾運動的突破口。遼縣屯糧提出的口號是「完成屯糧工作，打響實驗縣第一炮」。對地主等封建勢力完全採取進攻姿態，工作方式是大规模政治動員，召開群眾大會舉拳頭表決，以及請願遊行、半武裝示威，還有罰東西、捆人，甚至殺頭、戴高帽遊街等。屯糧只針對佔總戶數 10%-30%的富裕戶，其他群眾毋須負擔；春耕中普遍發生只借不還的「借地」、「借糧」現象，對於懶漢則捉拿打罰。鬥爭中，只打不拉，打到後來失去目標，鬥爭對象也模糊不清，形成了為鬥爭而鬥爭的鬥爭主義。¹⁹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另一個實驗縣武鄉。領導上行政命令、包辦代替是這一時期武鄉工作的典型特徵。在黨內表現為要求下級絕對服從，下級若提出不同意見，即以「成分不好」、「不執行決定」、「不積極完成任務」論處，使其不敢說話，不敢反映。高壓之下，以打罵捆罰代替政治動員成為常態，甚至出現為完成黨交辦的任務而故意製造鬥爭及執行「群眾意見」（在幹部命令下提出來的）打人的現象。1938、1939 兩年來，武鄉幾乎無一村沒有鬥爭過，凡鬥爭的村都打過人。群眾大會上，群眾沒有說話機會，只能看人家舉手就舉手，且不敢不舉手。群眾害怕開大會，討厭開大會，但不敢不來，否則捆、罰。開會時有人站崗巡視，若有離退場，抓回來便是一頓打。鬥爭中領導上常集中注意力於分配土地，先造成緊張氣氛嚇跑地主，然後便執行分地。還有故意玩弄法令，使地主報地不完全，隨後便帶人去量，量出即定為黑地。在鋤奸上，把富人、國民黨、頑固分子、特務混為一談，誇大其活動，甚至連受壓迫的一般群眾也混在一起亂打亂鬥。²⁰

¹⁹ 〈遼縣實驗縣三年工作總結〉（1942年11月23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829-831。

²⁰ 建平，〈武鄉實驗縣首次活動分子動員大會總結〉（1940年4月25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263-266。

爲便於鬥爭，在一些地方，「頑固分子」的帽子隨意發放，典型者竟發展至「縣有縣頑固，村有村頑固，家有母頑固」。²¹

日軍華北方面軍的報告也有類似的反映。1938年7月，和順縣長張雨帆辭職，日軍宣撫班調查報告認爲，中共方面所主導的財糧徵收政策過於嚴苛，是導致其辭職的主要原因。報告稱張被要求以合理負擔辦法的理由對富戶攤派過重的負擔，而對特別富戶則以緊急費用借款的名義實際進行沒收；對不服從者，以漢奸行爲論處，由民眾團體沒收其財物，並予以社會制裁。報告認爲這些政策使張雨帆不堪壓力，最終不得不辭職。²²

不愛護根據地是普遍現象，「抓一把算一把」的情況廣泛存在。楊尚昆曾提到，冀南的借糧鬥爭不止是借地主、富農的糧，而且連中農、貧農的糧也借，有的地方甚至發展到搶糧。²³某地全年收入中，富戶捐佔了很大數目，借糧運動（即發動群眾向地主等有糧戶借糧）中的「自動捐」事實上是強迫的。武鄉流行一句話——「罰你一個自動捐」，其間曲折不言而喻。少數部隊走一處吃一處，沒有一定的辦法解決糧食問題。在晉西北的「四大號召」（屯糧、獻金、兵員、鞋子）中，因爲「獻金」地主老財自殺者興縣17人、臨縣6人、嵐縣3人，逃走201人，文交地區竟逼著新媳婦照婚書交首飾；爲了屯糧到處挖窖，且樂意人家說沒有，那樣便可以下手去挖。²⁴

有資料顯示，在屯糧、借糧運動中，遼縣桐峪地主負擔佔全村66%，黎城一村一百餘戶僅4戶負擔，榆社一村3戶地主負擔佔全村67%，遼縣一地主1939年因停租收入僅100石米，但其該年負擔卻爲400石。²⁵

²¹ 〈太南二年來的政治工作——王孝慈在地代會上的報告〉（1941年9月），《太行各分區黨的文件選輯（第二分冊）》（內部文件，1944年7月），頁335。

²²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96。

²³ 〈楊尚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九月高幹會議上報告的摘錄——建設根據地的基本原則〉（1940年10月3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679-680。

²⁴ 〈楊尚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九月高幹會議上報告的摘錄——建設根據地的基本原則〉（1940年10月3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681-682。

²⁵ 〈太行根據地土地問題材料初集〉（1942年9月10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612-613。

如楊尚昆提到的情況，鬥爭到一定程度後，鬥爭對象開始超出地主、富農、士紳這些優勢階層的範圍，普通群眾也成爲受害者。不少幹部認爲革命已到無產階級專政階段，黨員是根據地的專政統治者，因此驕傲蠻橫，欺壓群眾，甚至有人提出要消滅地主階級。還有把黨看做「幫口」，作爲黨員便可仗勢欺人，藉黨可以升幹部。²⁶

投機分子、異己分子把持支部，束縛同志，把黨變成自己爲非作惡的工具，貪汙腐化，剝削欺壓，在合理負擔的名義中多收錢，屯糧中多收糧，以捆、罰、打、禁閉相威脅，使群眾不敢作聲。有地方群眾連糠都吃不上，村幹部則由村公所開支吃館子、賭博。²⁷

在「戰鬥的作風」及「迅速完成任務」等主導下，正確的策略路線、優良的工作作風全然不顧，濫用民力、隨意要差、強買牲畜層出不窮。五角錢一隻羊，一角錢一隻雞，四角錢定作一雙鞋，都算理直氣壯「買來的」。政權幹部和農會工會幹部，包括一些共產黨員，讓群眾送柴送麵，無代價作活支差。²⁸

另一個事例也體現了幹部之傲慢。晉豫地委一委員在總結該地群眾鬥爭經驗時提到軍隊的糧食問題，他說中央軍雲集陽城時，糧食供給發生很大問題，每天餓肚子，中共方面則用條子，地方黨很快就動員出糧食來。²⁹該委員竟提到如下「經驗」：

在戰後的擴大會議上，有一頑固村長提出這樣問題：「八路軍吃糧不拿錢，該如何辦理？」縣長說：「八路軍吃糧不拿錢誰都知道，蔣委

²⁶ 建平，〈武鄉實驗縣首次活動分子動員大會總結〉（1940年4月25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265-266。

²⁷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關於鞏固黨的工作的總結〉（1941年10月8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824-825。

²⁸ 雪峰，〈鞏固太北根據地與太北黨的戰鬥任務〉（1940年3月17日），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上）》，頁133。

²⁹ 高宗智，〈戰爭中的晉豫〉（1939年9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二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577。

員長沒辦法，閻司令長官也沒辦法，因此我縣長也沒有辦法。」用很巧妙的話打擊了這個傢伙。³⁰

「十二月事變」³¹後，因鬥爭氛圍熱烈，晉冀豫區「左」的傾向更加嚴重，違反政策與法令亂捕殺人現象進一步增多。潞城縣委組織部長，不經縣委討論地委批准，亦未經政府法律手續，親自帶公安隊到游擊區捉漢奸叛徒，當場槍殺 2 人，帶回數人，略加審訊再槍斃一人，全未宣傳解釋，引起群眾恐慌。³²更為極端的是平西縣長黃晟耀、二科長賈全琦，二人貪汙搜刮群眾、亂搞女人、亂殺人，不順從者即以漢奸之名處死，竟殺了一百多人。群眾苦不堪言，噤若寒蟬，上級被蒙蔽很久，到極嚴重時始發覺。³³

在發起群眾運動時，領導上也提出了一些目標，諸如擴補武裝、壯大組織、發動群眾等。其中發動群眾是一個相當模糊的目標，而對於具體如何達成，領導上並沒有給出明確的路徑指導，只是籠統要求完成任務，無暇顧及具體採取什麼方式，往往也未能有效約束操辦者的行為。在緊迫的形勢下，路徑不清晰，政策卻很激進，混亂局面之出現也就在所難免。

二、糾「左」

群眾動員的過火現象其實較早就引起了注意。晉豫特委關於 1938 年以來群眾運動的總結中即指出多種應予糾正的問題：農村貧富對立嚴重，窮人背鍋到富人家去，把守水井不讓富人吃水；借糧逼人跳井，捆村長要求擺席請全村

³⁰ 高宗智，〈戰爭中的晉豫〉（1939 年 9 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二卷）》，頁 580。

³¹ 1939 年 12 月 3 日，閻錫山下令重兵進攻共產黨領導下的山西新軍，並大肆屠殺抗日政府及救亡團體，史稱「十二月事變」，也稱「晉西事變」。

³²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關於鞏固黨的工作的總結〉（1941 年 10 月 8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 842-843。

³³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關於鞏固黨的工作的總結〉（1941 年 10 月 8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 842。

人；犧盟會宣傳組織農會以分富人糧食；幹部總想找錯沒收他人財產。³⁴李雪峰在晉冀特委擴大會議上也曾提到三區的借糧鬥爭「忽視統一戰線」。³⁵

冀豫晉省委在對晉中的巡視報告中指出，該地工作一大缺陷在於「黨化一切」，黨化犧盟會、黨化農會、黨化各種群團組織，各系統的群眾工作實際都由黨主導甚至是包辦，群眾處於被動地位。省委指出有黨化，就沒有擴大而深入的群眾運動，就不能有深入的敵區工作，也就無法達到沒有一個人不擁護的標準。與之相關的是，領導上過於強調下級對上級的服從、群團對於黨組織的服從等現象也為省委所批評。³⁶

冀豫特委在巡視中也注意到許多地方在實際工作中不講統一戰線，以黨代政包辦群眾團體，黨的工作團成為黨政軍民統一領導機關；還有故意讓農會代替村政權去執行合理負擔；對富農抱歧視態度，農會不願讓富農加入，鬥爭常常過火，邢台等地減租二分之一。³⁷

1939年4月，時任北方局駐晉冀豫區委代表的朱瑞在該區委民運幹部會議上檢討晉東南群眾工作時指出，自上而下的發展是本區各地工作的特點，因此工作有些官辦性，群眾團體黨化與軍事化的傾向相當突出。群眾工作上的困難主要表現在缺乏經驗和缺乏幹部，其工作經驗相當多是過去遺留下來的，有些是蘇維埃時代經驗的機械搬用，在實際中極易出現過「左」錯誤。加之群眾對過去及當時環境不滿，鬥爭一開始也容易過「左」。朱瑞分析，群眾工作缺點的重要原因，在於群眾運動是在軍事的勝利與影響之下，以及軍隊的掩護與保證之下開展起來的，群眾對軍隊的尊重和模仿，不但模仿了軍隊的優點，也模仿了軍隊的缺點，造成不民主化和軍事化。不過，雖然發現了問題的癥結，

³⁴ 〈晉豫邊區黨過去三個月工作的總檢討與目前的具體工作——晉豫特委活動分子會議上的結論〉（1938年4月19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卷）》，頁183-184。

³⁵ 〈李雪峰在中共晉冀特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1938年7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卷）》，頁285。

³⁶ 〈對晉中工作檢查總結報告大綱——（冀豫晉省委）巡視報告之一〉（1938年7月14日），中共太行區黨委，《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補編》（內部文件，1944年6月15日），頁5。

³⁷ 〈中共冀豫特委關於冀豫工作巡視總結報告大綱〉（1938年8月19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卷）》，頁349-350。

但朱瑞仍然強調「最中心的還是服從於戰爭，從戰爭的觀點上來進行與建立一切工作、生活與制度」。³⁸

1940年初，晉東地委書記賴若愚在縣委書記聯席會上指出，晉東各地行政命令簡單化的領導方式仍嚴重存在，如在榆社檢查屯糧變成搜查糧食，不作政治動員，不經過群眾路線；擴兵中以當兵作為處罰，歸隊運動成為捆人運動。³⁹

外在形勢的變化使中共方面更加注重發展和鞏固根據地，這也加速了領導上糾「左」糾偏的進程。在山西的政治格局中，初期大體上是閻主共客，但隨著局勢的變化，特別是中共在自身發展上的積極進取，二者關係逐漸惡化。「十二月事變」則標誌著閻錫山聯共政策的明顯轉向。這種情況下，中共一方面保持克制，繼續謀求維持統一戰線，另一方面也強調要穩住自身陣腳。194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在閻錫山「秘密勾結日寇，公開勾結老蔣，繼續反共反八路反新派」的情況下，山西工作重心應放在「建立新政權，動員民眾」、「鞏固現有陣地，嚴陣以待」上。⁴⁰

與閻錫山關係的破裂，事實上也驅使中共方面審視自身過去的作為。過去與閻錫山合作時，合法的政權在閻方，中共許多時候並不站在前臺，常常是以犧盟會的名義或者地下黨來發揮作用，處在相對隱蔽的位置，是否對政權負責自然不會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如李雪峰所言，因為過去不曾有過統一的政權以及相應的領導經驗，反因「半」政權養成慣於「走私」式地「抓一把」的作風。⁴¹冀豫晉省委也坦承在太原失陷後，曾認為山西的政權將垮臺，「搶一把

³⁸ 朱瑞，〈論晉東南的群眾工作——開展鞏固深入統一的群眾運動，粉碎敵人的新進攻〉（1939年4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二卷）》，頁247-251。

³⁹ 〈兩月來晉東工作的總結——賴若愚在縣書聯席會上的報告〉（1940年1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56。

⁴⁰ 〈中央對山西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25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2，頁241-242。

⁴¹ 雪峰，〈鞏固太北根據地與太北黨的戰鬥任務〉（1940年3月17日），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上）》，頁135。

就搶一把」的觀點和做法盛行。省委意識到若要建立根據地，則必須放棄這一短視做法。⁴²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該決定針對相持局面中的悲觀情緒以及汪精衛投敵，要求堅持發展抗日進步力量，爭取時局好轉，避免時局惡化。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做了有關抗日統一戰線策略問題的報告，提出「必須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⁴³

此前群眾鬥爭中出現的種種過火情況，顯然不符合以上有關維護統一戰線的決定和政策的要求。在摩擦增多、分裂加劇的情況下，即便不爲了抗戰大局，僅僅是應對摩擦和反動進攻，也必須盡可能鞏固根據地。1940年3月，時任晉冀豫省委書記的李雪峰在《戰鬥》撰文指出，「鞏固太北抗日根據地，是堅持華北抗戰一個戰略任務」，「沒有鞏固的太北抗日根據地，就難擊破敵人的『掃蕩』和頑固派從後方來的襲擊」。李雪峰尖銳指出，雖然「鞏固抗日根據地」提出已有年餘，但這塊根據地仍然「非常不鞏固」。李雪峰對各種摧殘根據地的「內奸」行爲提出了嚴厲批評，說這種只顧眼前暫時利益的行爲，只曉得狹窄的局部的利益和嚴重的本位主義，其特點是喜歡亂、製造亂，乘亂到處「抓一把」，抓一把算一把，「拾在籃裡就是菜」，不管群眾利益，不爲長久計畫。李雪峰對於「戰鬥的作風」以及「迅速完成任務」這種實際明顯走偏的工作作風也提出了批評，稱在這種作風的主導下，策略路線、政治動員都成多餘的了，實際工作變成「不斷的要求群眾，『動員』群眾，沒有系統的滿足群眾的要求，只有『利用』群眾作不斷的政治鬥爭，照例命令來開大會，命令反

⁴² 〈中共冀豫晉省委建立太行根據地會議報告〉（1938年3月20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卷）》，頁152-153。

⁴³ 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卷2，頁745。

摩擦，命令來反對頑固分子」。⁴⁴李雪峰說，為鞏固根據地，工作上必須有「大的轉換、大的改造」。⁴⁵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開太行、太岳、冀南高級幹部會議。這次黎城會議既是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統戰策略的指示，更是針對根據地發展現狀而作出變革的部署，如會議閉幕詞所言——「檢查了過去，進行了自我批評」。⁴⁶為了鞏固和擴大根據地，黎城會議明確提出三大建設問題：建軍、建黨、建政，這在太行根據地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如果說三大建設是「立」，之前的群眾運動則主要是「破」。「破」雖然有助於快速打開局面，但群眾鬥爭難以精確掌握，運動極易過火，一旦過火必然反噬自身，對根據地造成傷害。屯糧運動、合理負擔已經對根據地內的生產造成了嚴重衝擊，牲畜數量銳減，荒地明顯增加，亂捕亂殺等殘酷打擊的後果在當時及之後不斷地顯現出來。鄧小平即認為當時會鬥的發展可能和亂捕殺人有關。⁴⁷有關黎城離卦道事件的調查報告也顯示，在根據地的腹心地區，到1941年仍然發生數百人暴動投敵，相當原因應歸於此前過火的群眾運動。⁴⁸晉冀豫區農救總會提到，有些地方牲口減少90%，荒地增加三分之一。⁴⁹大批地主典地、分家，用一切辦法逃避負擔，生產情緒極低。⁵⁰

⁴⁴ 雪峰，〈鞏固太北根據地與太北黨的戰鬥任務〉（1940年3月17日），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上）》，頁132-136。

⁴⁵ 雪峰，〈鞏固太北根據地與太北黨的戰鬥任務〉（1940年3月17日），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上）》，頁138。

⁴⁶ 〈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閉幕詞〉（1940年4月），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內部文件，1943年11月20日），頁169。

⁴⁷ 〈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鄧小平同志的發言〉（1940年4月），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頁164。

⁴⁸ 1941年10月12日，黎城縣離卦道數百道徒暴動，攻打中共縣政府、公安局等機關，被根據地方面平息。暴亂中有九十餘人投向敵偽。該事件起因有不同說法。詳見〈黎城考察團離卦道事件調查報告〉（1942年4月），黎城縣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檔號54-1-14；孫江，〈文本中的虛構——關於「黎城離卦道事件調查報告」之閱讀〉，《開放時代》，2011年第4期，頁5-27。

⁴⁹ 〈晉冀豫區農救總會二年來工作材料〉（1941年6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407。

⁵⁰ 〈太行根據地土地問題材料初集〉（1942年9月10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612-613。

針對過去的嚴重偏向，楊尚昆在會議報告中明確提出「反對不愛惜根據地和抓一把的現象」，要求必須樹立「華北是整個八路軍的根據地的觀念」，「任何部隊到任何地方都要愛惜，在任何地方抓一把，都是抓爛整個根據地，破壞整個工作」。⁵¹楊尚昆還特別提到，紅軍長征的深刻教訓便是「沒有建立一個根據地」。⁵²晉冀豫區黨委在之後的工作總結中說，這次會議明確了根據地的觀念，而這一點過去是比較模糊的，過去也從未提出過「愛護根據地」的口號。⁵³可見，「愛護根據地」雖本應理所當然，但並非與生俱來。

黎城會議關於建政問題做了一個會議結論，主要涉及安定社會秩序和安定民生等兩個方面。關於民生方面，主要有以下改變：一道關口一定稅則，商、軍同等待遇；重訂屯糧政策（公布徵收標準，最高 30%，負擔起點從貧農起，嚴格徵收一次）；堅決執行法令，不隨意支差；嚴格脫產編制；不准縣區村隨意籌款。在安定社會秩序方面，明確表示政府將布告保護抗日人民之人權，區村無捕人權，縣無殺人權，違者反坐；還將建立司法秩序和重頒「懲治漢奸」法令。⁵⁴

1940 年 4 月 23 日，在會議還未閉幕時，晉冀豫區黨委即發布《關於執行保障人權的緊急通知》，直言不諱地指出：「最近各地不斷發生亂捕人殺人的嚴重現象。個別地區甚至採取狹隘的報復手段，草菅人命，實行恐怖行爲，引起社會上一些人士的不安，予群眾以極壞的影響。」⁵⁵區黨委指出這是「直接破壞我抗日根據地的秩序，對根據地的鞏固以莫大的損害。」通知重申政府法令——禁止隨便捕人殺人，縣政府不經專員公署批准沒有殺人權，區村政府沒

⁵¹ 〈楊尚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會議上的報告——目前政治形勢與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 年 4 月 16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 206-207。

⁵² 〈楊尚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會議上的報告——目前政治形勢與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 年 4 月 16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第 202 頁。

⁵³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一九四〇年領導的基本總結與一九四一年領導的方針與方法〉（1941 年 2 月 24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 173。

⁵⁴ 〈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關於建政問題結論〉（1940 年 4 月 24 日），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頁 166-168。

⁵⁵ 區黨委，〈關於執行保障人權的緊急通知〉（1940 年 4 月 23 日），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上）》，頁 158。

有捕人權。區黨委要求各地根據此通知立即開展檢查糾正工作，保證政府的這一法令迅速實現。

1940年5月2日，根據地方面以「山西三區專署」名義（以示對閻錫山的尊重）頒布施行《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第一條開宗明義：本署為安定社會秩序，鞏固抗日根據地，特頒布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該條例除了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及財產買賣自由，還保障居住行動自由、抗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自由，其中還規定軍隊亦無逮捕權（必要時須經過縣政府）。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北版稍後刊布這一條例，並配發社論〈論保障人權〉。⁵⁶晉冀豫區黨委為配合「百團大戰」給正太沿線黨的指示中特別強調應「廣泛的宣傳政府法令，尤其是『保障人權』的法令，宣傳根據地的建設與秩序」。⁵⁷根據地方面，糾「左」之急迫和決心可見一斑。

三、轉變之難

保障人權法令直指捕人殺人、行政命令等一整套過「左」的動員方式和工作作風，突如其來的新政策面對因襲已久的慣習，其間糾葛在所難免。晉冀豫區黨委第二次民運幹部會議表示，反對行政命令將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鬥爭過程」，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克服。⁵⁸時任武鄉縣委書記的溫建平在建設武鄉實驗縣的會上說，基本問題在於轉變「左」的觀點，他也提請與會者認識到徹底轉變工作與領導方式，爭取群眾是一個「最艱苦的鬥爭過程」。⁵⁹賴若愚在晉中縣書聯席會議上指出：「行政命令、平均主義的工作方式與作風十分凝固，

⁵⁶ 〈山西三區專署公佈施行保障人民權利條例〉；〈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社論：論保障人權〉，《新華日報》（華北版），1940年5月17日，第1版。

⁵⁷ 〈晉冀豫區黨委為配合「百團大戰」給正太沿線黨的指示〉（1940年8月26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檔號A01-08-3-7。

⁵⁸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第二次民運幹部會議記錄摘要」（1940年4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150-151、176-178、181。

⁵⁹ 建平，〈武鄉實驗縣首次活動分子動員大會總結〉（1940年4月25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267。

造成黨內上下隔離、黨與群眾隔離的現象深刻存在」，這些成爲開展工作的主要障礙。⁶⁰晉冀豫區農救總會也指出幹部行政命令的高度發展，形成了工作轉變的極大困難。⁶¹值得一提的是，在 1943 年太行分局的整風運動中，黎城會議因糾「左」被認爲是對幹部「潑冷水」而成爲重要議題，是幾個對於過去工作的主要批評意見之一。⁶²時隔三年，仍有許多幹部質疑黎城會議作出的調整，足見「左」的影響之深以及轉變之難。

保障人權法令等新政策頒行後，地方上普遍表現出不適應，新精神與舊辦法衝突明顯。

對新政策的不適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或明或暗地繼續過去的做法，一是無所適從，消極以對。就前者而言，新政策施行後，沒了打罵、守門這些做法，群眾開會沒有以前齊整了，以致有幹部說「群眾是牛是馬，非命令不行」。⁶³保障人權法令規定村幹部沒有捕人權，在實際中以監視代替逮捕的方式應運而生，其他違反人權法令的情形也常常發生。⁶⁴由於領導上對轉變的堅持及不斷教育，以及各階層對新政策的積極反應，繼續過去做法變得愈發困難。

在對於新政策無所適從的情況下，更多的幹部選擇了以不作為來消極應對，由此產生的新問題是「幹部不亂幹，也就不敢幹了」。⁶⁵晉冀豫區黨委很

⁶⁰ 〈一年來工作總結與今後工作——若愚同志在晉中第三次縣書聯席會上的報告〉（1940年10月），《太行各分區黨的文件選輯（第二分冊）》，頁178。

⁶¹ 〈晉冀豫區農救總會二年來工作材料〉（1941年6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386。

⁶² 〈羅瑞卿同志二月十二日在太行分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2月12日），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印，《一九四三年太行黨的文件選輯》，1944年9月，頁81-84。

⁶³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十三縣三十九個支部的初步研究〉（1942年9月20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692。

⁶⁴ 〈楊尚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九月高幹會議上報告的摘錄——建設根據地的基本原則〉（1940年10月3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685。

⁶⁵ 待甫，〈遼縣實驗縣工作總結〉（1940年10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719。

快注意到，保障人權法令引起了「幹部的苦悶」。⁶⁶彭濤（時任晉冀豫區委常委）曾分析過新政策施行後幹部消沉苦悶的原因。由於只掌握了政策的批判性，而忽視了政策的鬥爭性，在實際中著重強調自我批評，這種情況下，幹部陷入上級責備、群眾孤立的無援境地。⁶⁷太岳區一位幹部在保障人權法令頒布後的一次座談會上向士紳說：「我們過去一切都錯了，過去是農會專政、工會專政。」⁶⁸領導上當然難以認同全盤否定過去，以討好士紳的方式。

彭濤說在武鄉保障人權法令引起當地幹部的強烈不滿，行政命令只是在形式上被克服，新政策並未深入幹部、深入群眾，工作成效實際上在下降。⁶⁹

在實驗縣遼縣，新政策提出後，不少幹部表示「莫明其妙」，比較新的幹部接受的同時表示懷疑，比較老的幹部懷疑之餘消極怠工，加上支部及基本群眾「左」傾情緒一時不易克服，幹部行政命令的方式難以迅速改變，因此出現「上轉下不轉，黨外轉黨內不轉，新幹部轉老幹部不轉，主觀上轉作起來又不轉」，整體上是「少數轉了多數還沒有轉」。⁷⁰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榆社。政策轉變以後，榆社的工作表現出嚴重的垮臺現象，主要原因即在於幹部抵抗新政策，認為那是一種束縛，保障人權了，工作就沒辦法開展。⁷¹不少地方誤解保障人權法令，甚至出現另一個極端——明知敵探漢奸活躍也無計可施或麻木不仁。⁷²

⁶⁶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關於武鄉工作的意見〉（1940年7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511。

⁶⁷ 彭濤，〈一年來轉變武鄉工作的經驗教訓——在武鄉縣委擴大會上的報告〉（1941年5月），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頁55-56。

⁶⁸ 〈楊尚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九月高幹會議上報告的摘錄——建設根據地的基本原則〉（1940年10月3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683。

⁶⁹ 彭濤，〈一年來轉變武鄉工作的經驗教訓——在武鄉縣委擴大會上的報告〉（1941年5月），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頁54。

⁷⁰ 待甫，〈遼縣實驗縣工作總結〉（1940年10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718-719。

⁷¹ 建勳，〈榆社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份工作總結報告〉，《太行各分區黨的文件選輯（第二分冊）》，頁229、234。

⁷² 鄧小平，〈反對麻木 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1941年4月28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262。

保障人權法令針對的是打人、捕人、殺人這樣的過激行動，照一般情形，這只是底線性的規定，影響應當有限，不曾料到事實上卻對工作造成如此嚴重困擾。這樣的結果更加凸顯和證實了過去的群眾工作對打人、殺人等過激手段的高度依賴。

面對各地幹部普遍的抵觸情緒，領導上堅持進行教育和反復表達堅決施行新政策的決心。北方局及中央層面，對於過去「左」的情況提出了明確批評和定性。彭德懷在北方局九月高幹會上明確指出「借糧運動」是不對的，他說「借糧」既成爲運動，結果將走到「分糧」，必然增加地主甚至富農的恐慌。軍糧無法撥濟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由政府出據暫借，到期必須如數歸還或折價還錢。⁷³對於前述晉西北「四大號召」中的過火行爲，北方局認爲這完全是違反政策的，並且這一錯誤的後果，使根據地在政治影響上所受的損失短期很難恢復起來。北方局要求晉西北方面對這一錯誤作出明確的結論，不能模稜兩可，不能運用「雖然錯了，結果不錯」的公式來掩蓋錯誤，減輕責任。⁷⁴

晉冀豫區黨委分析當時的形勢稱，「各階層還在向心與離心中打圈子，友黨對我還是堅決反對，逃亡者回來不是爭取的結果，而是威脅沒有了，知識分子苦悶，基本群眾若即若離，這種現象是必然的。一方面是政策沒貫徹，一方面是過去工作的惡果。」區黨委反復申言「要求每一幹部都瞭解『克服一切困難只有貫徹新政策』」，轉變的中心環節在於「幹部觀念的轉變」，不能滿足於「開會的轉變」，並要求「隨時注意幫助，要使幹部瞭解、學習新的工作方式」。⁷⁵

⁷³ 彭德懷，〈關於根據地政權及農村統一戰線問題〉（1940年9月25日），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上）》，頁174。

⁷⁴ 〈楊尚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九月高幹會議上報告的摘錄——建設根據地的基本原則〉（1940年10月3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682。

⁷⁵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關於武鄉工作的意見〉（1940年7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510-511。

四、新政策向何處去

「左」的影響之深與慣性之大，顯然不是僅憑幾番教育就可以扭轉。一如遼縣實驗縣工作總結所指出的那樣：「新政策的轉變與幹部作風民主是分不開的，因為沒有民主的作風就不可能有民主組織的建立及新政策的轉變，反之亦然。而作風的民主化恰恰是一個意識改造的過程，是領導上一絕大的教育任務及持久的動員工作，企圖簡單以行政命令來克服行政命令是根本不可能的。」⁷⁶既然舊辦法、舊作風的「復辟」是工作中的主要危險，那麼創造一套新的辦法則勢在必行。晉冀豫區黨委研究武鄉縣的工作後，認為要實現轉變必須「徹底改造政權，建立制度與運用制度」，並指出「左」的根源在於成分，因此要從「教育、改造與整理支部中來轉變」。⁷⁷

就支部的成分而言，從晉冀豫區十三縣 39 個支部的情況來看，中農以上成分佔優勢；在領導成分上，中農以上優勢更大，一般超過 50%。⁷⁸支部成分中，與之前工作過「左」密切相關的一類是「流氓」。據區黨委的分析，「流氓」的典型特徵是：動搖性、破壞性大，以個人利益而隨風轉舵，有很厲害的統治階級特權思想，慣於使用行政命令及善於玩弄手段。參加黨後，依靠黨進行鬥爭，取得地位後容易「抓一把」，私利觀念濃厚，普遍貪汙腐化。⁷⁹他們之所以被認為是「流氓」，多半好吃懶做、作風敗壞，早已惡名昭著。作為村中邊緣人，他們基本不受或較少受人倫關係規約，少有顧忌，敢打敢幹。

⁷⁶ 待甫，〈遼縣實驗縣工作總結〉（1940年10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720。

⁷⁷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關於武鄉工作的意見〉（1940年7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511；彭濤，〈一年來轉變武鄉工作的經驗教訓——在武鄉縣委擴大會上的報告〉（1941年5月），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頁54。

⁷⁸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十三縣三十九個支部的初步研究〉（1942年9月20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697-699。

⁷⁹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十三縣三十九個支部的初步研究〉（1942年9月20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700。

據晉冀豫區 8 個支部統計，共 17 個「流氓」，都在 1937、1938 年入黨，其中 6 個為支部領導。⁸⁰另一組資料顯示，整黨前 22 個支部的領導層 44 人中有「流氓」12 人。⁸¹從中可以看出，在農村支部中「流氓」不僅佔據了相當的比例，而且其中許多人由於入黨早，並且敢打敢幹，已身居領導層。組織創建初期，這些成分之所以被吸收，正是看重他們身上敢打敢幹的特質。從實踐看，這種特質無疑是雙刃劍：一方面幫助打開局面，另一方面對組織和根據地造成傷害。由此可見，之前群眾運動中諸般過「左」行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組織發展不慎重的惡果。晉冀豫區黨委稱「流氓成分可以改造，但比較困難」，⁸²因此主要處理辦法是以貪汙、投敵等理由予以開除，再補充好的幹部。

與清理支部及村政領導層中流氓成分相關的是村選及村政委員會建設。黎城會議提出的「建政」目標落到基層，主要便是村政建設，領導上認為村政委員會是「政權直接組織群眾、深入法令、實現政策的組織，是政權組織的基本單位，也就是政權建設的主要標誌」。⁸³以遼縣為例，建政前遼縣只有 33 個編村，村級政權幹部共 99 人（每村村長、書記、村警各一人）；建政後僅遼東就有 71 個編村，各村普遍建立村政委員會，共有 1,324 人管理村政，平均每村有近 20 人，大多數村廢除了村警、書記，只有村長一人脫離生產。⁸⁴建立村政委員會的過程，除了整理成分，還顯著擴大了群眾參政，這無疑有助於協調各階層各群體利益以及保證政策的正確執行。

⁸⁰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十三縣三十九個支部的初步研究〉（1942 年 9 月 20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 699。

⁸¹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十三縣三十九個支部的初步研究〉（1942 年 9 月 20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 706。

⁸²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十三縣三十九個支部的初步研究〉（1942 年 9 月 20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 699。

⁸³ 待甫，〈遼縣實驗縣工作總結〉（1940 年 10 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 723。

⁸⁴ 待甫，〈遼縣實驗縣工作總結〉（1940 年 10 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 718。

與太行區施行新政策差不多同時，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權在人員構成上實行「三三制」。鄧小平曾指出，「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問題。⁸⁵群眾工作中的種種偏向，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咎於沒有堅持民主的作風與方式，一旦真正實現民主，便可從根本上革除前述弊端。在這個意義上，「三三制」也成為太行根據地革除舊弊、完成民主建政的新路徑。李雪峰曾在《戰鬥》上撰文強調「民主的工作方式」之重要，他指出民主制度的建立與正確運用、民主的工作作風，是密切與群眾關係與從工作中教育群眾的基本方式，也是把群眾運動、群眾鬥爭與群眾的組織結合起來的基本工作方式。民主地提出問題、討論問題和決定問題，能使群眾感到自己的力量，感到自己對自己負責，由此才能密切與最廣大群眾的關係。⁸⁶

和保障人權法令施行後的情況相類似，「三三制」政策雖然為民眾所擁護，但遭到了幹部的較強抵制。鄧小平和彭濤都提到「三三制」在晉冀豫區曾遭到黨內一部分人的抵抗，縣以下表現尤為普遍和強烈。⁸⁷幹部抵制的主要理由是，如果黨員只佔三分之一，會出現「黨說了不算」的情況，如何實現領導？這顯然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棘手問題。

對於「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中的優勢問題，鄧小平在一份有關根據地政權建設的重要文件中作了回答：要一方面從組織成分上去獲得，這在「三三制」原則本身是包含著的；但更基本的是從民主政治鬥爭中去取得，主要依靠黨的主張能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所擁護、所信賴的政治聲望中去取得。確切地說，黨的優勢不僅在於政權中的適當數量，更在於群眾的擁護。威望源於群眾真誠擁護，當然是最為良善的政治之道。只是，對於早已習慣「槍桿子出政權」以及以威壓人的革命幹部（尤其是基層幹部）來說，無疑又是巨大的挑戰。鄧

⁸⁵ 鄧小平，〈黨與抗日民主政權〉（1941年4月15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231。

⁸⁶ 雪峰，〈論深入群眾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1940年7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三卷）》，頁505-506。

⁸⁷ 鄧小平，〈黨與抗日民主政權〉（1941年4月15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231；彭濤，〈晉冀豫區的新形勢與新任務〉（1941年6月27日），中共太行區黨委，《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頁77。

小平特別提到，中國作為一個半封建、缺乏民主的國家，共產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習慣，缺乏民主政治鬥爭的常識與鍛鍊。⁸⁸彭德懷也有類似的判斷，他提醒不要把民主教育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因為「中國人民素來沒有民主習慣」。⁸⁹民主素養如何習得，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如何弭平，任重而道遠。

五、策略地鬥爭

從前文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領導上期待徹底扭轉過去「左」的、無章法亂鬥的混亂局面，將之引向民主的軌道上去。實際的情況是，儘管堅持教育和動員，也設計和施行了相應的民主制度和辦法，但普遍的情形是根據地的群眾運動仍然由此陷入低潮。日軍連續的「治安肅正」與「治安強化」使根據地面臨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平淡的群眾運動現狀顯然難以滿足火熱鬥爭現實的需要——群眾沒有動起來，最基本的錢糧、兵員的籌集動員都成問題。這種轉變中的困局，一如晉冀豫區農救總會的總結：農民運動發動起來必然過「左」，糾正後又必然向右，必然與農民對立，幹部也會脫離群眾。掌握新政策與繼續發動農民運動是一對矛盾。⁹⁰

沒有鬥爭，政權組織沒有力量，各項工作也開展不起來，但又不能亂鬥，因此「如何鬥爭」成了新的問題。彭濤曾指出不能因為怕「左」而不敢鬥爭，因為不鬥爭並不能克服過「左」的鬥爭，只有正確地運用民主鬥爭，才能克服錯誤的鬥爭。他說有鬥爭歷史的群眾，長期受抑制不鬥爭，是必然走向消沉的，群眾的消沉又會增加黨轉變的困難，因此還是要「從鬥爭中發動群眾」。⁹¹

⁸⁸ 鄧小平，〈黨與抗日民主政權〉（1941年4月15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230-231。

⁸⁹ 〈彭德懷在太行區軍隊營級、地方黨縣級以上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2年12月18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911。

⁹⁰ 〈晉冀豫區農救總會二年來工作材料〉（1941年6月），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四卷）》，頁397。

⁹¹ 彭濤，〈一年來轉變武鄉工作的經驗教訓——在武鄉縣委擴大會上的報告〉（1941年5月），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頁56。

晉冀豫區黨委曾提出新形勢下如何開展鬥爭的問題。區黨委分析稱，過去的群眾鬥爭，偏重於政治方面，如反摩擦、開大會等，多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實際取得的成效非常有限，對發展黨組織的意義也不大；到根據地統一一致了，工作環境比較單純，如何發動與領導群眾鬥爭，反而更難了，特別是新政策實施後，群眾鬥爭是消沉的。區黨委認為，如何發動與領導群眾為實現黨的政策而鬥爭，以及鬥爭的策略口號、方法方式等問題，是應作研究的。區黨委就農會的領導策略有這樣的指示：農會的任務，很明顯的不是站在群眾上面或群眾外面向群眾「要求」，而應是站在群眾中間領導群眾為實現負擔的公平與合理而鬥爭，如此才能既完成任務又組織起農民。⁹²

關於鬥爭的策略，彭德懷曾在太行區的一次縣營級以上幹部大會上舉過一正一反兩例。在遼縣麻田的減租鬥爭中，一位不識字的婦女充當農民代表，與地主極力交涉後，地主僅部分接受要求。此婦女代表轉身面向農民問「是否滿意」，同時背向地主，將手置胸前頻搖，農民得其示意，一致鼓噪，表示不滿。該婦女代表趁勢轉向地主，繼續交涉。彭德懷說這就是「具體靈活運用鬥爭策略」的例子。另一個策略運用不當的例子是，遼縣某村在進行減租鬥爭時，農民到地主家裡吃飯，要吃豬肉大米，烙餅還要紅糖做餡子。彭德懷說這種不近人情的做法是會失掉社會同情的。⁹³

作為北方局書記，彭德懷在如此重要的會議上不厭其煩地講述這種具體實例，側面反映出根據地內的群眾鬥爭已經進至需要精細化組織的階段。正如彭濤之前就指出的那樣——「隨著民主政治的實施，各階層將進一步地發動與覺醒，根據地社會的發展與階級鬥爭將帶著非常生動與複雜的性質。」⁹⁴

⁹² 區黨委，〈關於農會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中共太行區黨委，《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頁3。

⁹³ 〈彭德懷在太行區軍隊營級、地方黨縣級以上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2年12月18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939。

⁹⁴ 彭濤，〈晉冀豫區的新形勢與新任務〉（1941年6月27日），中共太行區黨委，《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下）》，頁75-76。

形勢要求鬥爭講策略與精細化組織，但現實總是存在差距。為應對百團大戰後根據地不斷被壓縮的嚴重局面，增強民眾對共產黨和八路軍的信仰，太行區於 1941 年到 1942 年在全區範圍內掀起了以減租減息為中心的群眾鬥爭。鬥爭發起時，領導上直言不諱地指出，要通過鬥爭使農民「認識剝削關係與剝削實質，儘量暴露地主階級的兇惡，對農民的欺壓狡詐，暴露其偽善面目，打破農民『良心下不去』的舊觀念，啓發其階級意識，明確階級對立，堅決回答、駁斥『等天晴』，『中央軍來了八路軍要走』等謠言，以鼓舞農民鬥爭勇氣，防止地主抽地、轉典等威脅，鞏固鬥爭情緒。」⁹⁵基於以上言辭激烈的指示，為了使群眾盡快動起來，在這次大規模的運動中，打人、捆人、蠻幹、亂鬥、包辦再次普遍上演，其強度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榆社提出「幹部不轉變，幹部負責幹，錯了，縣委負責」，武西提出「每個幹部必須領導一個鬥爭，每個村必須有一個鬥爭」，這與前幾年的情況並無明顯不同。⁹⁶置身這輪鬥爭的浪潮之中，能明顯感受到此前種種糾「左」的努力似乎不曾有過。

對於此輪鬥爭中的過激情形，中共上層也注意到了。毛澤東曾坦率地指出：「因為國民黨的反共和我們不得不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自衛鬥爭的這些情況，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過左的偏向，例如以為國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過分地打擊地主，不注意團結黨外人士等。」⁹⁷

彭濤基於太行第三分區群眾運動的實際，直言不諱地指出，「從策略的觀點來檢查每個群眾鬥爭，真正成功的鬥爭是極少極少的，只有在國民黨指導強有力的地區，和環境非常複雜的地區，我們才知道講一些策略（這也與幹部有關），但也是被迫的，或者說得正確一些是支部有力量的地區，在農民優勢的地區，或者說得恰當一些，支部優勢的地區，是最不容易講策略。」許多幹部

⁹⁵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關於執行土地政策的指示〉（1942 年 4 月 15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 245。

⁹⁶ 彭濤，〈三分區群眾運動的一般概況與經驗教訓〉（1942 年 12 月 10 日），《太行各分區黨的文件選輯（第三分冊）》（內部文件，1944 年 7 月），頁 131-134。

⁹⁷ 毛澤東，〈學習與時局〉（1944 年 4 月 12 日），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卷 3，頁 943。

把鬥爭看得非常簡單，他們的鬥爭公式是：第一，支部動員（或者不動員）；第二，開群眾大會；第三，在會場上提出問題，喊口號要求答覆；第四，處罰鬥爭對象，打一頓或扣起來，於此就算是鬥爭的勝利。他們認為自己有勢力，於是不管大事小事，遇事必鬥，不分對象，不看成分，有一點錯誤就鬥，這樣一來，就容易使得真正應該鬥爭的頑固分子，反而隱蔽起來，把很多不應該的鬥爭對象（只是執行政策的），過分的打擊了，打得他們與頑固勢力靠攏。⁹⁸

對於此次減租減息運動中的過火行爲，劉少奇在 1942 年底有這樣的指導意見：

群眾運動起來了，可能有掌握不住的情形發生，因為群眾不動則已，既動起來，往往超過我們的主觀願望，有些過左、過火的現象。有的同志對這種現象，感到害怕。應該認識，群眾運動起來發生過左是一回事，領導的過左又是一回事。應該把群眾行動上的過左，和幹部領導上的過左，嚴格區別開來，因為這是有原則差別的。領導上的過左，是左傾機會主義，是犯錯誤，是不允許的，應該禁止的。群眾起來有些過左的現象，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應該害怕的。⁹⁹

從劉少奇的「群眾行動上的過左」和「幹部領導上的過左」的區分來看，太行區的糾左大體上是糾正領導上的「左」。關於這一點，鄧小平有類似看法——「只有當我黨能夠及時掌握與恰當糾正『左』的現象時，『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讓『左』的東西發展到破裂統一戰線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¹⁰⁰按照這個標準，此輪減租減息鬥爭中的過「左」並非失控的結果，而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應該害怕的」。在實踐中，確實有這樣來區分和操作的。武鄉在此輪群眾運動中發生打人事件共計 72 起，晉冀豫區黨委在給中

⁹⁸ 彭濟，〈三分區群眾運動的一般概況與經驗教訓〉（1942 年 12 月 10 日），《太行各分區黨的文件選輯（第三分冊）》，頁 135。

⁹⁹ 劉少奇，〈關於減租減息的群眾運動〉（1942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劉少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 240。

¹⁰⁰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結論——根據地建設與群眾運動〉（1943 年 2 月 20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六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 165。

央的報告中特意提到其中群眾自動打人的 39 起，村幹部領導的 18 起，幹部知道不阻止的 15 起。群眾自發的佔主導，區黨委認為這相較過去由村幹部出頭甚至違反民意打人，是一種進步。¹⁰¹

結 語

1937 年初，劉少奇在關於「西安事變」和群眾運動給張聞天的信中，言之諄諄地表示「左」傾錯誤是大革命時期的沉重教訓。劉少奇說群眾運動的「左」傾錯誤極易發生，且一旦發生影響重大，「常常用盡一切方法還糾正不過來」。劉警告說預防這種錯誤「異常重要」。¹⁰²在之後的白區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對「左」傾錯誤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其乃八七會議以來黨內長期存在的一種「錯誤的惡劣的傳統」，並提出「我們黨與群眾的全般工作在今後是要實行一個徹底的轉變」。劉少奇雖然尖銳地提出了問題，但當時並不具備徹底解決問題的條件。別具意味的是，隨著日本侵略危機日益深重以及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劉少奇在白區工作會議結論的最後說：「現在需要我們鐵一般的團結起來，緊張的動員起來，動員全華北群眾，鼓動群眾，組織群眾，為實現黨的任務而戰鬥。」¹⁰³劉少奇這番話雖然沒有直接否定本次會議糾「左」的主題，但「鐵一般的團結起來」、「緊張的動員」、「為實現黨的任務而戰鬥」都預示著在接下來的革命實踐中將難有一個寬鬆的糾「左」環境。

¹⁰¹ 〈中共晉冀豫區黨委關於執行土地政策指示給中央的報告〉（1942 年 10 月 30 日），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五卷）》，頁 790。

¹⁰² 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 219。楊奎松稱這幾乎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領導人唯一一篇公開批評大革命時期「左」傾錯誤的文字。詳見楊奎松，〈50 年來的中共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頁 178-202。劉少奇的這篇文章還被收入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輯，《批判資料——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內部資料，1967）。

¹⁰³ 劉少奇在白區工作會議上結論的記錄（1937 年 6 月 10 日），轉引自金沖及，〈劉少奇和白區工作會議〉，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科研管理部編，《歷史偉人劉少奇——紀念劉少奇百年誕辰論集》，頁 35-36。

到抗戰階段，在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左」的做法在基層再次大行其道，並給根據地自身帶來嚴重傷害，繼而不得不嚴厲糾「左」。在「左」與糾「左」的反復中，領導上對「左」的認識發生了顯著變化，大體而言就是「左」不可怕，且在某些情況下是必要的——因其在動員上的顯著成效，其理由是領導上認為群眾運動是可控的。在對「左」的處理上，得出的一個重要認識是要區分群眾行動上的「左」和組織領導上的「左」，前者不可怕，對於後者則須保持警惕。從之後的歷史進程來看，這種關於「左」的認識和判斷並非就此而止，而是一再出現。這種區分體現了領導上對於群眾運動的主動節制，但由此也產生了新的問題：群眾之「左」與領導之「左」各自的邊界在哪裡？遺憾的是，過往的實踐幾乎都未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

究其本質，激進化的動員既是追求效率的反映，同時也是目標與現實之間較大差距的必然結果。過火鬥爭的背景往往是情勢的危急，就太行而言，1938、1939年有立足的危機，1941、1942年面臨根據地不保和與對手爭奪群眾的危機。爲了救急，爲了生存，常規手段難以奏效或者不能立竿見影，這種情況下除了不斷向下施壓進而營造高壓氛圍，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對於承受巨大壓力的基層政權來說，常常不得不引導和縱容農民對鬥爭對象採取激烈手段，甚至施以暴力，以此摧毀鄉村社會原有的權勢結構和人際網絡，進而幫助革命政權掃除動員中的障礙以建立新的秩序。近代中國普遍困苦的民生和積鬱已久的民怨，也爲「左」的發生提供了溫床。多種要素交互作用下，人類社會之惡極易瘋狂滋長，一、兩個邊緣人即可攪動鄉村。反之，如果不允許違反原則，不允許暴力，則可能很難打開局面，群眾動員不起來，一切從何談起？而一旦對激進化的動員形成了依賴，再想擺脫則極爲不易，甚至需要在下一輪動員中升級強度。領導上當然清楚過火的鬥爭必然帶來嚴重危害，不然不會頻繁地糾「左」，也不會有事實上居主導地位亦更爲常用的苦口婆心、不厭其煩、細緻入微的政治說服和動員，但這並不會完全阻止「左」之再次發生，群眾運動也並非如預期中那般可控。以暴力奪取政權的革命路徑，一開始就註定了不僅不

能溫良恭儉讓，甚至還充滿腥風血雨，同樣也註定了革命者常常不得不面臨類似的難境。回到歷史的情境，會發現在「左」與糾「左」以及再「左」這樣的往復之中有諸般不得已，革命與戰爭的殘酷於此亦可見一斑。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晉冀豫區黨委爲配合「百團大戰」給正太沿線黨的指示〉（1940年8月26日），山西省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檔號 A01-08-3-7。
- 〈黎城考察團離卦道事件調查報告〉（1942年4月），黎城縣檔案館藏，《革命歷史檔案》，檔號 54-1-14。

二、專著

- 山西省檔案館編，《太行黨史資料彙編（第一—六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2000。
- 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上、下）》，內部文件，1943年11月。
- 中共太行區黨委，《太行黨六年來文件選輯補編》，內部文件，1944年6月。
- 中共太行區黨委編印，《一九四三年太行黨的文件選輯》，內部文件，1944年9月。
- 《太行各分區黨的文件選輯（第二、三分冊）》，內部文件，1944年7月。
-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輯，《批判資料——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內部資料，1967。
-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組譯，《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劉少奇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卷2、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薄一波，《論犧盟會和決死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 薄一波著作編寫組編，《薄一波論新軍》，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冊11、1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 《中共中央北方局》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戰爭時期卷）（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三、論文及專文

- 王奇生，〈革命的底層動員：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收入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61-97。
- 李里峰，〈「群眾」的面孔——基於近代中國情境的概念史考察〉，收入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31-57。

金沖及，〈劉少奇和白區工作會議〉，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科研管理部編，《歷史偉人劉少奇——紀念劉少奇百年誕辰論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 18-39。

孫江，〈文本中的虛構——關於「黎城離卦道事件調查報告」之閱讀〉，《開放時代》，2011 年第 4 期，頁 5-27。

廉如鑒，〈土改時期的「左」傾現象何以發生〉，《開放時代》，2015 年第 5 期，頁 150-161。

楊奎松，〈50 年來的中共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頁 178-202。

四、報刊

《新華日報》（華北版），1940。

《戰鬥》，增刊期 15，1943。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bilization: The Rectification of Leftist Tendencies in the Taihang Base Area

Wang Longfei^{*}

Abstract

Mobilization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as well as practic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revolution, the CCP continuously modified its means as well as its interpretation of mobilization. A conundrum faced by the CCP in mobilization was that it was either entirely unsuccessful, or exhibited extreme leftist tendenc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owing to the uniqu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Taihang Base Area, extreme leftist tendencies grew dramatically for a time, causing serious harm to the Base Area itself and compelling the CCP leadership to adopt drastic measures to curb these tendencies. Alternating between "moving leftwards"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lef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ft" by the CCP leadership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 The CCP leadership generally felt that "moving leftwards" was harmless, even necessary, because it was confident in its ability to control mass movements. From its treatment of "the left," the CCP concluded that the party ought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leftist actions of the masses and the leftist tendencies of its own leadership, and that the former was harmless while the latter had to be guarded against. Judging from the trajectory of the subsequent history, this interpretation and judgment of "the left" as well as the conundrum of mobilization did not end with the War of Resistance, but kept reappearing long after the war was over.

Keywords: mobilization of the masses, rectification of leftist tendencies, Taihang Base Area, Licheng Conference

*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